

俄羅斯轉軌啟示錄：評葉利欽時代

◎ 蘇文

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天，葉利欽（Boris N. Yeltsin）宣布辭去俄羅斯總統之職，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葉利欽結束了蘇聯帝國，這在一些人看來是大功，另一些人則認為是大罪。功乎罪乎，未來的歷史會作出判斷。我們不妨用一種中性的眼光看，不談「姓資姓社」，只說他在瓦解了一種體制而建立一套新體制的過程中，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

無疑，從體制轉軌的角度看，葉利欽時代的特點是「破舊」有力而「立新」無術，不僅俄國經濟一直沒有走上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軌道，而且政治上也沒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過渡。於是俄國一直處於轉型期危機之中，迄今未能自拔。

在經濟方面，人們常提到俄羅斯在轉軌時期經濟滑坡的時間與程度，它不僅與經濟持續增長的中國形成對比，也比大多數東歐國家的情況更糟糕。這些國家在一段「陣痛」之後多已恢復了持續增長。人們還提到，俄國不僅經濟總量上不去，經濟體制更新也遠未到位：「私有化」進程並未真正地明晰了產權、改變軟預算約束狀況、產生創業激勵；貨幣主義政策並未真正制止通貨膨脹與現實預算平衡；農業中並未出現家庭農場制度的興盛，而仍然是衰敗中的「翻牌集體農莊」居優勢；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稅收、金融、社會保障體系也未能建立，國家收不上稅，但仍然要維持舊體制下由國家包下來的那套「保障」體制，不出財政危機那才怪了；轉軌近八年，俄國並沒有形成像樣的民間資產階級與自由僱傭勞動者階級，更談不上中產階層的發達，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處於有權勢者致富、無權勢者貧困的狀態。但在筆者看來，經濟「立新」不成功的基本標誌是：俄國經濟至今無法形成一種投資激勵機制，以致於即使在俄羅斯其他經濟指標出現「好轉」苗頭的時期，投資萎縮的趨勢仍未能遏制。而無論甚麼「主義」的經濟，沒人想投資也不會有正常的再生產機制與要素配置功能，其他指標「好轉」也只能是鏡花水月。在社會結構方面，人們通常都以俄羅斯寡頭金融工業集團的興起來作為首要的批評對象，但重要的還不在於「寡頭」這一概念所顯示的分配不公平，而在於這些「寡頭」還遠未形成如日本、韓國那樣的、按市場經濟規則運作的大財團。俄羅斯的「寡頭」權貴色彩濃於其「大資產階級」色彩，他們多是舊體制下的官僚出身，與政權的關係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與其說體現了「資本的權力」不如說更像是「以權力為資本」。如果他們真能演變為「大資產階級」（雖然也有這種趨勢），像日、韓的財團那樣成為足以拉動經濟的大規模投資者，那也算是以不公平為代價實現了轉軌的成功。然而，至少目前，情況還遠非如此。

在政治方面，轉軌的成就應當說比經濟好些，然而也還談不上完成，比多數東歐國家包括前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也要差一截。1993年的炮打白宮（俄國議會所在地）表明俄國人還遠未學會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其後的新憲法體現的總統集權也有違民主制下的權力制衡原則。然而由於規則不健全，機構無效率，事務官的專業素質比政務官的民主素質更差，加上地方「諸侯化」的影響，使俄政府的實際行政能力低下，形成了「集權的弱政府」的畸形狀況，

這與現代法治民主國家實現的是「權力制衡的強政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時，俄目前政黨政治的發展水平也很低，小黨林立而缺乏有影響的大黨（俄共除外，但實際上俄共影響也在下降之中），這與中東歐各國大都已從眾黨林立的初期階段發展出成熟的兩黨（或數黨）理性競爭的體制相比，差距甚大。俄國不少政黨有濃厚的「會黨」、「朋黨」色彩，人際關係紐帶重於思想、政綱紐帶，卡里斯瑪魅力重於主義的影響，競選主要是個人魅力的角逐，而非黨及其綱領的較量。以致許多俄國政黨在名稱上就顯得非「綱領化」且突出個人色彩，如「祖國」、「家園」、「我們的選擇」、「亞博盧」等。顯然，即使在政治方面，俄羅斯轉軌也還有相當一段路要走。

除了經濟、社會、政治以外，俄羅斯在民族關係上至今仍未找到一條實現「瑞士式的多民族祖國」的路，在國際關係上至今無法給自己在冷戰後世界明確定位，在軍事上也沒有定下新的戰略思想與軍事體制。總之，說葉利欽「破舊」有方而「立新」無術，大體是對的。

葉利欽時代是個有成有敗的時代，對葉個人而言，是失敗大於成功，但對於俄羅斯的轉軌而言，則成功大於失敗，而從葉利欽執政的歷史看，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91年「8·19」政變到1992年中蓋達爾（Yegor Gaidar）辭退代總理之職，這是葉利欽崛起為俄國第一號人物、瓦解舊體制並全面推進激進改革的時期，是葉利欽政治生涯的「黃金時代」。「8月政變」被粉碎後，葉利欽以「民主拯救者」的姿態贏得很高聲望，成為俄羅斯乃至全蘇實際上的掌權者，而被「救」出的戈爾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ev）則大權旁落，已被架空，到年底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下台後，葉利欽便從名到實、從權力到聲譽都達到了頂峰，1992年初他開始全力依靠以蓋達爾為代表的「青年改革家」推進經濟轉軌。但半年之後便因「休克療法」引起的社會反應及議會的抵制而難以為繼。到年底蓋達爾下台，當時的「中派」「公民聯盟」提名的切爾諾梅爾金（Viktor Chernomyrdin）出任總理，標誌著俄羅斯改革的「浪漫主義時期」結束，葉利欽「凱歌行進」的歲月也告終了。

從轉軌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葉利欽的兩個失策無疑加劇了困難。第一，在「8·19」政變後、蘇聯解體前，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實際上即俄羅斯與聯盟中央）的充分合作是挽救蘇聯、至少是在某種範圍內維持聯盟以渡過轉軌時期的唯一機會，政變後戈爾巴喬夫已徹底轉向民主派，他與葉利欽之間已無路線分歧。而這時葉的聲望正隆，不僅在俄羅斯、而且對許多加盟共和國擁有影響，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的象徵，在國際上比葉更有聲望。另一方面，僅從當時核控制的角度，國際社會（主要是西方各國）也不希望蘇聯解體，而願意看到一個制度劇變後「親西方」的蘇聯仍維持某種統一。因此，葉、戈合作挽救聯盟，至少存在延緩其解體的可能性。然而，由於個人恩怨和權利欲，也由於反政變勝利沖昏了頭腦，葉利欽這時對戈爾巴喬夫十分傲慢無禮，俄羅斯實際上在拆聯盟的台，致使聯盟在僅僅四個月間便迅速解體。不能說葉利欽不想維持以俄為中心的聯盟，但他至少沒有認真幫助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聯盟中央。而聯盟統一經濟空間的解體對轉型期危機雪上加霜的程度，是出乎當時那些陶醉於「獨立浪漫曲」的人們意料之外的。據一些經濟學家分析，1991-95年間獨聯體各國的經濟滑坡幅度中，約有50%以上是統一經濟空間瓦解的後果，只有40%多是制度變革的「成本」。

也是由於「勝利沖昏頭腦」的結果，使葉利欽陶醉於自己的個人魅力，在急於給聯盟找麻煩

的同時，卻沒有因勢利導地改革俄羅斯自身的權力體制，使俄羅斯帶著蘇聯時期選出的議會（蘇維埃與人大）和憲法進入了「激進改革」。這個憲法對議會與總統的權力沒有明確地劃分，一旦雙方產生分歧，就會出現「兩個政權並存」的混亂狀況。這個議會具有很大權力，其多數成員在舊體制下擁有權益，他們雖然在「8月政變」中支持政治民主並擁護葉利欽，但難以接受激進的市場經濟與私有化改革。在「休克療法」引起痛苦的情況下，他們很快與社會上的抵制力量結合，成為葉利欽的反對派，使「休克療法」在議會的強烈抵制下實際上只實施了半年便告流產，由切爾諾梅爾金取代了蓋達爾。其實，如果葉利欽在1991年8月以後抓住時機改選議會、修訂憲法，他在次年的經濟改革中就會得到議會的更多配合，「休克療法」的結局可能會大有不同。即使不能收波蘭的巴爾采羅維奇、捷克的克勞斯之效，至少也會比後來斷斷續續的「多次休克」、「長期休克」付出的代價小一些。

二

從1992年年中議會迫使政府修改預算，基本放棄財政、貨幣雙緊縮的「休克」政策，直到1993年10月炮打白宮，是葉利欽時代的第二階段。這一時期議會在逼退蓋達爾、剎住「休克」風之後勢頭大增，與葉利欽從交惡到全面對抗。「執行權力系統」則發生分化，副總統魯茨科伊倒向議會，而原由「中派」提名的總理切爾諾梅爾金卻在幾經搖擺後選擇了追隨葉利欽。於是「兩宮」（克里姆林宮和當時議會所在地白宮）之戰愈演愈烈，經過全民公決，憲法法院參與，政治鬥爭成為俄羅斯社會生活的重心，而經濟轉軌處於停滯狀態，致使經濟局勢不斷惡化。最終以葉利欽炮打白宮，驅散議會，通過新憲法實行總統集權而告終。

炮打白宮當然是民主政治下的越軌行為。但由於當時「兩個政權並立」的僵局已造成了混亂，此前的全民公決支持了葉利欽，加上事變時又是議會方面首先動武佔領市府並進攻電視台造成流血，因此人們對民主俄羅斯發生如此悲劇雖然傷感，但對葉利欽的批評還是有限的。更多的非議是在經濟方面。

至今談到這段歷史，俄國內外都有強大的輿論把「休克療法」列為第一大誤。的確，以蓋達爾的「休克療法」開始的俄國經濟轉軌應當說搞得很糟糕，但別的办法是否會好一些則很難證明。畢竟，進行了激進改革的波蘭、捷克等東歐國家與前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經濟轉軌都比俄羅斯成功得多，而沒搞「休克療法」的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如今的經濟狀況決不比俄羅斯好。誠如王金存等學者所指出的：就前蘇東地區各國的比較而言，激進改革的國家在中長時段上付出的總代價一般要小於「漸進」的國家，而不管激進還是漸進，轉軌初期的經濟滑坡則是各國無一例外的現象。中國的情形與東歐有很大不同，是不好簡單類比的。進而言之，究竟甚麼叫「休克療法」，從而哪些國家在甚麼時段上搞了這種療法也是個爭議極大的問題。許多德國學者把「休克療法」理解為財政、貨幣雙緊縮，從而認為前東德是唯一避免了「休克」的地方。但波蘭學者科沃德科卻從私有化的角度認為，只有前東德搞的才算「休克療法」，其他蘇東國家包括波蘭，實際上都沒有出現這種實踐。筆者認為，狹義的「休克療法」本是指以財政、貨幣雙緊縮來治理通貨膨脹（這個術語在拉美經濟實踐中出現時就是此意），其下藥雖猛，但只是一種技術手段而與「主義」無關，其目的在於糾正經濟失衡而非改變經濟體制，是一種穩定經濟而非改造經濟的藥方。但在東歐，這個術語有時被泛化為指稱變革經濟體制的一切激進做法，包括放開價格、大規模私有化、對外開放等等。

在1992年初的俄國，這兩種意義上的「休克療法」實際上都很少迴旋餘地。當時俄國已經連續兩年經濟滑坡，又突然面臨經互會「大家庭」經濟空間與蘇聯統一經濟空間雙重解體的衝

擊，經濟失衡已到了無論甚麼「主義」者都無法容忍的地步，以緊縮遏制通脹的「休克」大概是誰在台上都難免要搞的。而私有化在那時幾乎是眾望所歸，就是俄共也表示，如果私有化不可避免，那就只有平均分配，而不能讓國有財產落到少數人手裡。因此那時出現的《證券分配法》恐怕也難有替代的選擇。同時在明知「陣痛」與風險難免的情況下，趁「8月勝利」後「民主大潮」中民心可用而發動「闖關」，也比人民熱情過去後經濟狀況更糟時再在埋怨聲中讓他們「休克」風險要小些。可見當時那種轉軌決策，也的確是大勢所趨。

在此之前，蘇俄已經出台了沙塔林計劃、亞夫林斯基計劃、雷日科夫計劃、雷日科夫—沙塔林折衷方案、帕夫洛夫「反危機計劃」等。這些計劃與蓋達爾的方案哪一個更好，也許並不值得討論；它們都沒能扭轉經濟局勢。事實上，無論激進還是漸進的方案都不是萬應靈藥，但也不失為一種選擇，關鍵在於任何方案都有其行為邏輯，其有效性取決於這種邏輯能否貫徹到底。無論激進還是漸進，都比一忽兒激進、一忽兒保守、朝令夕改、沒有章法要好。在葉利欽與議會的拉鋸戰中，任何療法都不能貫徹到底，其療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1992年7月，俄羅斯議會推翻了政府的緊縮預算，大幅放鬆銀根。這時「休克療法」僅持續半年，議會的行為給人的感覺是：俄羅斯人民已難以承受了。然而那時「承受」的東西——無論是較抽象的經濟指標下降，還是人們確實感受到的拖欠工資之類，在數年以後實際上是更沉重了。如果說1992年7月按議會的說法不放鬆緊縮就會發生社會爆炸，那麼1993年「10月事變」中人民沒有起來支持議會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實上，1992-93年、特別是「兩宮之戰」期間，不同的民意調查表明，這個時期葉利欽的聲望固然大大下降，但反葉的議會方面的民意基礎更差。就整體而言，這個時期俄國人並沒有失去對「激進改革」的期望。而實際上，在議會壓力下放棄財政、貨幣緊縮的結果是靠大印鈔票來彌補赤字、增加國企補貼，飲鴆止渴而使經濟更加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務實的切爾諾梅爾金只能傾向於再緊縮，這就是這位「中派」提名的總理何以在一度猶豫後又成為「沒有蓋達爾的蓋達爾路線」代表者的原因。其實這種現象在東歐也不乏其例，許多靠反對「休克療法」起家的在野黨，包括左派（如匈牙利社會黨、保加利亞社會黨），一上台也不得不搞「休克補課」，只不過是在更困難的情況下搞罷了。

由於政策搖擺不定，導致經濟與貨幣無法穩定，「私有化」也搞得很糟糕。本來，「證券私有化」作為在國有資本基數大、無買主而且公眾又有起點平等願望條件下的一種私有化起動方式，雖有其缺點（股權過於分散，無法形成資產責任），但在許多東歐國家如捷克，還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俄國由於貨幣急劇貶值，資產估價嚴重失準，而且在政局多變的情況下企業折股工作極為遲緩，致使私有化證券長期有價無市，在不穩定氣氛下人們也沒有持券信心，因此儘管俄政府一再號召公眾慎用證券，許多人還是為一瓶酒之類的代價便出讓了自己的一份，導致嚴重的入市前投機。加之俄國證券私有化方案設計得也不如捷克周詳（如直接用盧布，而不是像捷克那樣以「投資點」計價，也沒有像捷克那樣建立記名帳戶以控制入市前投機），這一切使俄羅斯的證券私有化階段存在著嚴重弊病。雖然葉利欽政權在1993年4月全民公決後曾採取措施加快企業折股、規範證券市場，但不久再度激化的兩宮之戰及「炮打白宮」後立即展開的杜馬大選，又把這一切打亂了。

這樣俄國便渡過了混亂的一年，政爭激烈、改革出現混亂與停滯、經濟大滑坡，成為這個階段的特點。

從1993年10月白宮事件到1998年3月切爾諾梅爾金下台，為葉利欽時代的第三階段。白宮事件後，葉利欽消除了「兩個政權並立」的局面，通過總統集權的新憲法，使他成了「民選沙皇」，俄羅斯政局出現了葉利欽時代最穩定的局面。葉利欽大權獨攬，但並未縮小政治自由。以俄共與日里諾夫斯基為代表的反對派，在白宮事件後僅兩個月便在第一屆杜馬選舉中大顯身手，使新杜馬的成員中葉的反對派比重甚至高於舊議會。然而，此時政治遊戲規則已經改變：杜馬權力大為縮小，而反對派則從熱衷於政治鬥爭轉化為主要從事議會鬥爭。這兩點使這一階段的政爭相對溫和而有序，左派起家的議長雷布金與謝列茲尼奧夫反而比過去的「民主派」起家的哈斯拉托夫更能與葉利欽和平相處。俄國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無民主而有自由」或民主少而自由多的「新權威主義」格局。加上經過10月事件考驗後，切爾諾梅爾金徹底倒向了葉利欽，受葉任用為總理達五年多，政府的相對穩定使其得以實行一貫的轉軌戰略。經過四年多的調整，俄國逐漸實現了從穩定財政貨幣到穩定生產，從證券私有化到貨幣私有化、個案私有化的轉變。俄國經濟在1995年趨於穩定，雖因1995-96年間的「選舉戰」和車臣事件影響又有反覆，但到1997年上半年，已首次出現了回升的苗頭。

然而，這個時期也是葉利欽銳氣失而暮氣升的時期。經過前兩個階段的挫折、動盪與決鬥，葉利欽在實現「新權威」式相對穩定的統治的同時，也從一個「闖將」逐漸變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與行事的價值取向逐漸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改革過程中形成的各派別也由思想觀念的分野變為利益集團的分野。在這一過程中，「新權威主義」下的轉型經濟為權力資本的興起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所謂金融工業寡頭的壟斷勢力正是在這一階段形成的。如今，抨擊「寡頭」在俄國國內外，包括在中國知識界都已經成為潮流。但其中充滿許多似是而非之論，最流行的說法便是認為俄羅斯的金融—工業寡頭是民主化、市場化的「激進改革」造成的，是全民分配國有資產的「證券私有化」造成的，是西方勢力推動的。

這些說法頗值得懷疑。東歐各國都發生了民主化、市場化與「激進改革」，可是寡頭壟斷只在俄羅斯出現，這一事實本身就使民主化、市場化導致寡頭制的邏輯無法成立。其實已有不少學者指出，當代俄羅斯寡頭是由蘇聯時期的權貴階層或官僚階層演變而來的¹，現在的寡頭壟斷脫胎於過去的國家壟斷，寡頭制源於過去的集權制²。正如世界銀行駐莫斯科代表處專家斯塔杜波羅夫斯卡婭所說：金融工業集團「通常都被理解為是在國家庇護下建立起來的一種組織」³。換言之，它恰恰與「激進改革」要求限制國家干預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種一方面指責「激進改革」過份削弱國家干預，一方面又把作為國家干預結果的寡頭集團斥為萬惡之淵的說法，在邏輯上是矛盾的。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所副所長西蒙尼亞更指出：所謂金融寡頭不是一般的官僚資本，而是「官僚國家資本主義」。在這種情形中，「官員並不非法佔有國營企業的資本，而是在國營部門內部非法利用所有這一切」。他們「用各種形式上合法而事實上違法的方式把私人利益和國企活動聯繫在一起」，從而建立了「官僚資產階級對大型國營企業的控制」。而蘇聯學者巴弗連科更認為：「金融官僚資本並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國家所有制。」⁴換言之，寡頭資本與其說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國有資本，不如說是在市場條件下經營的國家資本，這些資本由於國家的民主程度不夠而被官僚控制並用以謀私。可見，形成寡頭的必要條件並非私有化過份，而是民主不足。

事實上，如今被稱為寡頭的「金融工業集團」正是在以蓋達爾為代表的青年「激進改革派」「闖關」失敗離開決策層後，由一些「穩健」的老經濟學家 and 技術官僚所大力提倡、國家大力支持、甚至往往就是由國家授權自上而下地組織的。因此，學者稱他們是「指令」形成的

寡頭。在「激進改革」時期，一些民主派基於在俄羅斯建立以廣泛的私有者為基礎的真正民主制的願望，同時也基於私有化之初社會上自發地湧現眾多小型商貿組織、作坊與小工廠表現出的經營靈活性與當時大多數大中型企業危機深重的鮮明對比，主張以發展中小型企業來走出困境。「闖關」失敗後這種意見被拋棄了。出身於國營大托拉斯的切爾諾梅爾金上任伊始便表示：「我們國家有強大的基礎設施，不應變成小商小販的國家」，「想用小店鋪把我們國家包圍起來並在此基礎上振興經濟改善生活的做法不會成功」⁵。1994年在結束證券私有化之際，以老經濟學家阿甘別吉揚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也表示反對分散化，主張「把國有大型企業改組為集生產、銷售、金融活動為一體的金融—工業集團」，認為這種組織「應在今後俄經濟中佔優勢」⁶。老經濟學家什梅廖夫也提出：俄羅斯今天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強大的工業—金融集團」⁷。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94年2月葉利欽提出1994年應成為「金融工業集團年」，並在此後兩年中連續出台了《促進金融工業集團建立並展開活動的措施》（1995年4月）、《關於金融工業集團的聯邦法》（1995年11月30日）、《關於促進銀行與產業界一體化》（1996年4月）等十幾個法令、總統令與行政法規。於是寡頭經濟迅速崛起：1993年全俄還只有一家金融工業集團，1994年便有了7家，1995年21家，1996年37家，1997年已有近60家。並進一步從中產生了「巨人中的巨人」，最終形成了後來的「七大寡頭」之制⁸。

正如亞夫林斯基所言：俄國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頭統治，這種體制在原蘇聯時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蘇共垮台後，它只不過改換了門庭，就像蛇蛻皮一樣」⁹。還應該指出的是，在今天俄國的政治譜系中，無論蓋達爾還是亞夫林斯基這些「民主派」都與金融寡頭的關係相當疏遠（丘拜斯是個例外，但1994年之後丘拜斯與蓋達爾實際上已距離很大，丘拜斯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國家主義者」了），而切爾諾梅爾金的「家園」才與金融工業集團關係最密切，甚至俄共也與這類集團有頗深的關係¹⁰。因此，無論「民主派」在其他方面的功罪如何（他們的「激進改革」的確有許多不切實際的東西，包括他們過份天真地相信西方列強會全力支持俄羅斯的「闖關」），說他們代表了寡頭的利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在現實中，俄羅斯寡頭集團的思想—政治代表只能是左與右的「新權威主義」者（1994年以後的葉利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帶有這種色彩），而不是甚麼「民主派」。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白宮事件後，即我們論述的這個階段中，金融工業寡頭對政府影響的增大（乃至於直接加入政府，如別列佐夫斯基等）與「民主派」的日漸失勢是二位一體的大趨勢。當然，葉利欽的「民主派」出身使他難以與後者劃清界限，出於政治權術的考慮，他也常常需要聯合「民主派」來對付俄共等主要政敵。而「民主派」中亞夫林斯基一派固然對葉利欽已完全失望，其反葉的調子有時比俄共還高，但蓋達爾等人還是願意支持葉利欽以對抗俄共。然而無論如何，此時的葉利欽已絕不是甚麼「民主派」總統了。

四

1998年3月，葉利欽突然解散了切爾諾梅爾金政府，由此開始了葉利欽時代的第四個階段也是最後的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葉利欽走馬燈式地頻繁更換政府，並且似乎已經完全亂了章法。基里延科政府任職僅五個月便被免職，任命切爾諾梅爾金復出受阻，葉立即改變主意挑了普里馬科夫。普氏上任僅八個月就被免職，換上斯捷帕申。斯捷帕申政府的壽命更短至兩個多月，再換了普京（Vladimir Putin）。葉利欽此時用人似乎已經完全不顧政績標準：切爾諾梅爾金是在俄羅斯經濟止跌回升、形勢看好時被免職，普里馬科夫是在克服金融危機、穩定經濟初見成效時被免職。斯捷帕申之免職也是莫名其妙，只有基里延科是踏上了「8月危

機」，但嚴格地講，主要責任也不在他。葉利欽此時用人似乎也沒有甚麼價值標準：基里延科接近於民主派，切爾諾梅爾金如前所說是寡頭新權威主義者，普里馬科夫以下三人都是克格勃出身，而普里馬科夫本人政治傾向是中左，斯捷帕申和普京則純屬事務官員。總而言之，葉利欽此時用人施政已既不講政績也不講「主義」，純屬為保住自己的地位及其善後而玩弄權術。因此很自然，這時的葉利欽幾乎受到各方的一致批評，包括原來擁護他的寡頭派。

葉利欽如此措置乖戾，固然與他在權力無制衡情況下「病夫治國」之不智有關，但也反映了葉利欽時代尤其是在上述第三階段中俄羅斯過渡模式——政治上的新權威加經濟上的寡頭化——的危機。在這一階段中，經濟雖然止跌回穩，國有資產也被寡頭們瓜分得差不多了，但社會矛盾卻積累起來，而葉的聲望也進一步下降。在眼看葉利欽病體難支、不能久任的情況下，葉利欽身邊的小圈子行為日益短期化，他們不僅不能為俄國的長遠利益、甚至已經不能為他們在上一階段所主要依靠的社會基礎即金融工業集團的長遠利益考慮，而只是著眼於怎樣能實現一種在「後葉利欽時代」盡可能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善後安排。

這就導致葉利欽在這一個階段的行為越來越走向個人權術，而這樣的短期行為又使俄國的轉型期危機拖長、經濟發展受損。本來在切爾諾梅爾金政府末期已開始回升的經濟，在進入「走馬燈時代」後又趨惡化。政府短期行為導致社會短期行為，尤其是資本的短期行為。而資本的短期行為則是金融危機的直接成因。8月金融危機雖然有其深層、宏觀的原因（無投資激勵機制經濟不能真正穩定、國際油價下跌致使俄羅斯國家財政狀況惡化、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俄羅斯金融系統的體制性問題等），但人們的心理預期惡化造成抽逃、擠兌無疑是危機的導火索。形成這樣的心理預期，葉利欽末期的唐突舉措是要負至少一部分責任的。

「8月危機」沉重打擊了俄羅斯的經濟及其轉軌過程，也使葉利欽的聲望進一步掉到谷底，而這又反過來使葉利欽身邊的「圈子」更擔心「後葉利欽時代」的局面，從而使葉利欽的行為更加短期化。如此惡性循環，終於使葉利欽的政治生涯趨於終結。

如今已經很明顯，無論就民心、政情還是葉本人的身體狀況而言，葉利欽都已不可能連任，而他要逆民心而採取非常手段搞獨裁恐怕也行不通。真正的問題是後葉時代會在怎樣的情況下到來？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人們看到了葉利欽時代（確切地說也是戈爾巴喬夫時代）留下的正面遺產在起作用。

葉利欽的寡頭轉軌模式誠然遠不如波捷匈的民主化轉軌，而葉本人的末期措置又是如此差勁。他在金融危機使俄國經濟再入谷底、支持者紛紛離去、民意背離、體力難支的最不利狀態下下台。從常理而言，從俄國歷史經驗而言，這是最容易引起「翻燒餅」的。而葉利欽體制雖然毛病很多，真要把它掀翻了來一場反攻倒算，只怕是更加糟糕。然而現在看來，俄國各方都表現得驚人地理智。當8月底危機來臨時，許多人斷言這不僅是一場金融危機，而且是俄國整個經濟轉軌進程「不可逆轉的失敗」，它將導致「整個政治上層建築的崩潰」，此後幾年俄國將發生大亂，人們只能討論「民族與國家的簡單生存問題」了。國內外很多人都認為，俄國已經面臨社會爆炸、秩序崩潰與內戰。

的確，就葉利欽本人而言，他對這場危機驚慌失措、束手無策，與過去歷次危機中他表現的極為果斷、敏銳、自信與機智形成鮮明對比。正如麥德維杰夫所言：「葉利欽的個人權力資源與政治資本已經耗盡，他已不再擁有能控制克里姆林宮之外事態發展所需的施政班子、執政綱領、精英與民眾的信任以及過去的精力與健康。」¹¹實際上，在這一時期中葉利欽已不

再是個「新權威」了。

然而俄國並沒有因此而大亂，甚至沒有給葉利欽很大難堪。與人們預期的相反，葉此後又換了兩屆政府，發起了車臣行動，都未遇到太大的反對。而議會的彈劾程序無疾而終，許多人預言會發展為「革命」的10月7日全俄大遊行也進行得十分溫和。更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危機後「左」「右」兩翼的極端思潮不盛反衰，而「中左」、「中右」漸成氣候。社會思潮的「中派化」使俄羅斯很有可能向後葉時代平穩過渡。總之，在葉利欽這個「強人」不再有能力逞強之時，當「新權威」的權威基本消失之際，俄國一沒大亂，二沒走極端，三沒走回頭路。在專制與極端傳統深厚的俄羅斯，葉利欽能依憲政程序離任已屬不易，而在最不利條件下仍能平穩離任就更近乎奇跡了。

這表明俄國人在葉利欽時代雖然付出了許多代價，但的確成熟了。他們很有希望走出歷史循環的怪圈。葉利欽時代儘管有自由而少民主，但基本的民主規則畢竟有了，葉利欽時代沒有建成市場秩序，但市場化的基礎也有了。而俄國人民儘管對葉利欽再不滿，他們也不想走回頭路。

總之，在葉利欽時代的四個階段中，葉利欽都既有出色的作為，也幹過許多蠢事。尤其在首尾兩個階段中更明顯：如果他在「8·19」政變之後不拆戈爾巴喬夫的台，而是葉、戈合作共創民主新聯盟，如果他不在反政變勝利後忘乎所以，錯過了憲政改革的最佳機會，他的「闖關」式改革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如果他前期倚重的民主派不把「證券私有化」設計得如此拙陋，後期倚重的寡頭自由派不那麼違反公正原則擴展權力資本，俄羅斯的轉型期社會問題不會如此嚴重。如果他在這兩年不那麼乖戾地頻繁更換政府，1997年的經濟回升有可能持續，1998年的危機可能避免，即使難免也可能不那麼嚴重。當然在另一方面，葉利欽是俄羅斯民主化、市場化改革的象徵，如果沒有他挺身而出帶領人民反擊「8·19」政變，蘇聯就可能出現第二個「停滯時代」。作為一個過渡型歷史人物，葉利欽順應了俄蘇人民擺脫舊體制的願望，因此曾深得民心。但他並沒有完全擺脫舊官僚那種專橫獨斷、剛愎自用的習氣，而在建立了「新權威」之後，權力腐蝕症在缺少制約機制的條件下在他周圍的小圈子裡蔓延，可能也傳染到他本人。作為個人因素，葉利欽是個「闖將」而不是深謀遠慮的思想家，喜弄權術而缺少真正的朋友，很少有人能與他長期合作。再加上他長期有病，導致行為亦常呈病態，「病夫治國」的負面影響也很明顯。對於俄羅斯的現狀，他是難辭其個人責任的。

認真分析葉利欽時代的歷史是意義重大的。然而，如今兩種似是而非的論點卻值得注意：「右」的一種認為俄羅斯虧在「平民主義」上，似乎如果不搞「平分證券」而一開始就放縱寡頭搞「亞洲自由主義」就好了。「左」的一種認為俄羅斯虧在「激進改革」上，似乎「普魯士道路」當年救不了沙俄如今卻可以救蘇聯。然而我們已經看到葉利欽時代既不缺寡頭也不缺新權威，他們所缺的不就是我們也要爭取的嗎？總而言之，葉利欽時代給我們的教訓決不是公正太多、民主太多，而是相反，我們需要更多的公正、更多的民主。

註釋

- 1 〔俄〕《消息報》，1996年1月10日說：前蘇聯官員出身者在總統班子佔75%，政府中佔74.3%，地方精英中佔82.3%，經濟精英中佔61%。其中，前蘇聯經濟官員在政府中佔42.3%，經濟精英中佔37.7%。
- 2 董曉陽：〈俄羅斯官僚資產階級是如何形成的〉，《東歐中亞研究》，1998年第6期，頁23。

- 3 伊·斯塔杜波羅夫斯卡婭：〈金融工業集團：幻想與現實〉，〔俄〕《經濟問題》，1996年第7期。
- 4 〔俄〕《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1996年第7期。
- 5 〈新總理贊成改革，但要對改革作出重大修改〉，〔俄〕《消息報》，1992年12月16日。
- 6 阿甘別吉揚：〈以增加投資來擺脫危機〉，〔俄〕《實業界報》，1994年5月16-22日；參見馬烏：《經濟與政權》（莫斯科，1995），頁50-54。
- 7 什梅廖夫：〈困境與前途俄羅斯改革階段預示著甚麼？〉，〔俄〕《獨立報》，1997年7月24日。
- 8 黃立弗：〈俄羅斯激進經濟改革與金融工業集團〉，《東歐中亞研究》，1997年第6期，頁38-39。
- 9 亞夫林斯基：〈俄羅斯虛假的資本主義〉，〔美〕《外交》，1998年5-6月號。
- 10 田永祥：〈俄羅斯政黨與金融企業的關係〉，《東歐中亞研究》，1998年第2期，頁38-43。
- 11 羅·麥德維捷夫：〈葉利欽時代的終結〉，《東歐中亞研究》，1999年第3期，頁94-95。

蘇文 中國大陸學者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0年2月號總第五十七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